

洒落的心语

■ 侯合心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洒落的心语

侯合心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 炜

责任校对：刘 明

责任印制：陈晓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洒落的心语 (Saluo de Xinyu) / 侯合心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049 - 9026 - 6

I. ①洒… II. ①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1807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 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15.75

字数 196 千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9026 - 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序

侯合心，1986年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学院统一分配导师与学生辅导关系时，他被分配在我的名下。当然，这种师生关系并不代表我们是第一次认识，因为在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恢复招生后的第二年，侯合心就考入本校银行系，成为七九级121个学生之一，而当时我也刚刚落实政策回到大学讲授《货币银行学》课程。

在四川财经学院1978年和1979年两级本科学生中，社会青年考生占有较大比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学生结构，作为经历过特殊历史和陷入过困惑的师者，不由自主地要对他们这一代人进行文化和历史定位思考，思考的内涵虽因历史复杂而复杂，但结论却是很清晰的：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属于“有交替和有区别”的两代人。有交替，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都共同经历了中国那段将永远存续于民族记忆的特殊历史；有区别，是因为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他们这一代人因为年龄的缘故，还无法对一切所见和所感进行深邃的社会学思考，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有能力而且也必然要对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进行哲学和政治学思考。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相对宽容、曙光乍现的时候，我曾经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而感到欣慰。

在侯合心研究生学习期间，大致知道他是一个在极度困境的生

活环境中长大，并完全靠着自身努力，以一个仅仅有“文革”时期农村初中教育基础考进大学的。侯合心属于“文革”时期经历过苦难一代年轻人中不甘认命的群体之一员，有个性坚韧的一面，同时也因为历史造就而有个性逆反的一面。毕业后，他和他们这一代考上大学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在带有传统“功成名就”内涵的所谓“事业伦理”的驱使之下，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些都反映在他本科毕业后三次进入工作单位工作，两次脱产再进入大学学习的过程中。

2003 年的 11 月，七九级同学毕业 20 周年回校纪念时，侯合心回到学校，我们见了面，当时他正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在南方某省的省政府工作，记得在我们交谈中，他告诉我：省政府很快会委派他到地、州去任职，从他说话的语气，能清晰感觉到我的这个学生不经意流露出的某种向往和喜悦。但不知什么缘故，2005 年他从国有大银行总行辞职，只身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一名老师，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是 2003 年 11 月他在回学校参加年级聚会时向我表达的那个结果。

2009 年秋天，七九级学生再次因入学 30 周年纪念在成都相聚，我们师生二人也再次在成都光华村见面。这一次见面交谈中，他向我说到类似于 2003 年见面交谈时说到的、但抉择截然不同的经历：2007 年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所在大学干部任免部门致电问其可否任职于他所在的学院，但他甚至都没有问一问究竟任什么职，就婉言谢绝了。我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讲述，保持了与 2003 年那次一样的态度，没有说任何带倾向性的话。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从内心讲，我仍然不能断定这样的抉择是否就是他个性的某种复归，更无法确定这种复归是否就反映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基于某种成

熟和有良知文化人的秉性而摒弃功利，并沉下心来思考与自身生命和生活，以及与生命和生活关联着的所有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

今年四月，侯合心将他围绕着亲情、友情所写的《洒落的心语》书稿发给我看，并请我为他写一个序，在看完整篇文稿后，我终于可以坚信：2007年的那一次抉择应该就是 he 回归自己的开始。

亲情体会，虽是血缘关系认识的反映，但因为血缘关系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是以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的，所以又并不简单反映为血缘认识，《洒落的心语》对血缘亲情、同学友情的认识和讲述，有荣耀也有屈辱，有喜悦也有悲苦，但无论是哪一种生活际遇，都与一段特殊历史和社会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洒落的心语》虽然表达的是亲情和友情，但本质上间接讲述了作为经历过那样一段特殊历史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左冲右突的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发现历史造就的性格与现实环境存在种种冲突，而这些冲突的存在有个人性格原因，但更多却并非个人操守和性格原因。

从内容上看，《洒落的心语》旨在揭示：作为性情至上者，在面对亲人而“亲情不待”，在面对朋友而“友情至尊”时，需要以并非面对面的空间环境来叙述自己的思考与体会，并以独白的方式向他生命构成中的每一个与之有关系的人袒露自己一份真实的“心语”。

从师者的角度看，这本书反映了他具有进行人性与社会问题综合思考能力，当然也有思考的局限性，因为所谓“亲情不待”如果不是个人操守而形成的人间悲剧，那么，一定就会有造成亲情不待的机制和环境原因存在，思不及这样深的层次，思考和理解就是不完整和不彻底的。

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足以让读者从字里行间隐约体会到以下作为有良知文化人内心的一份信念：

作为生命之人，生命构成中的每一个相濡以沫的主体都需要得到充分珍视与尊重；

作为文化之人，价值求索中对每一种得与失的思考都应建立在公义与人文基础上。

刘道民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于蓉城

目 录

父亲，我欲泣无声 1

- 一、生与死 4
- 二、罪与罚 10
- 三、贫与困 16
- 四、病与痛 29
- 五、哀与思 47

母亲，我欲哭无泪 53

- 一、童年·童媳 56
- 二、痛弃·迁徙 58
- 三、夫君·屈辱 65
- 四、生命·生活 70
- 五、贫瘠·灾难 76
- 六、亲情·纠结 80
- 七、弯弓·遣送 88
- 八、入学·辍学 91
- 九、衰竭·执着 97
- 十、失望·离世 101
- 十一、哭泣·无泪 108

唐旭，天堂很安静 115

一、同学·相识 118

二、师兄·师生 125

三、朋友·同学 139

四、病痛·离去 156

五、哀思·缅怀 174

儿子，我欲说还休 181

一、你之生 183

二、你之养 196

三、你之育 214

四、父之去 226

父亲，我欲泣无声

1990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初五）老父亲乘鹤西归至今，一瞬间十七年就过去了。

在老父去后的一段很长日子，我的情感一直辗转于：恍惚未失与已失、难以承认父亲已离我而去这一现实的真实性与这一现实确无疑义之间。也正是因为这种恍惚，我不得不反复地问自己：父亲之去是生命之自然归去吗？如果不是，父亲的离去是不是还包含着某种属于我、属于这窘迫困苦的生活世界的原因，于是，反复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痛苦地挖掘属于作为人子的自私、粗心和对血缘亲情冷漠的原因。合理化与非合理化、自我安慰与深深自疚、自愤与自抑，所有这些，都使我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屡屡于梦境与现实两界天地之间，辗转反侧，难以自解自拔。

那个悲伤的夏天，与兄长、小弟办完老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便匆匆准备返回重庆，当携带幼子登上汽车去80公里外的玉屏县搭乘火车时，老母亲及家人凄凄地站在车边送行。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与一生相关联的所有亲人都还没有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暗暗对自己说：等到我天年闲暇时，一定为老父亲写一篇生前记事，从父亲一生道路的梳理中去认真体会与世事巨变交织在一起的父亲，也许只有这样，我这个读了七年大学，也是三

兄弟中唯一有较高文化的人子，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生命的父亲和今天来车站站台上为我送行的所有亲人。

其实，根本不允许等到所谓“天年闲暇”，在父亲故去不久，兄长便来信问我，可否为老父亲写点什么。显然，兄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想在我之前了，否则，他不会写信来说这个问题。看了兄长的信，我理解为一种亲情的“催促”，一下让我看到了所谓“天年闲暇”是不近人情的，因为如果真的等到所谓“天年闲暇”，那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况且，在这纷纭杂沓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不能超越世俗欲望改变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世事忙碌碾压之下，灵魂是永远不会有一分真正的“闲暇”的。

直观地看，父亲之辞世与一般生命之逝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父亲生命存续的六十八个春秋的过程中，有属于老父亲自己区别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和生命内容。同时，作为父亲的子女，我和兄长、小弟三人也同样是基于中国那段特殊的历史，基于父亲传统中国文人的禀性，基于生长在那个贫穷落后大山里的家庭历史，点点滴滴，无不承领可能是与天下其他父亲对待儿女有所不同的生命关联和亲情关联。

记得在老父亲故去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的初冬，我当时工作所在的重庆市扬扬洒洒下起了漫天大雪。据重庆人说，像这样的好雪，于山城已经很久很久都未曾有过了。记性好一点的人们依稀还记得是1976年，即“文革”浩劫结束那一年，重庆下过一场大雪，算起来也是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对于重庆人来说，可以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领略到天降大雪，既可以是一种美丽的体会，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肃杀的回味。

时隔十五年，重庆又一次下起了大雪，为这久违的大雪，一些年轻人纷纷乘车去南山观雪景。不过，对于那些与我年龄相仿或稍大一些的重庆人来说，这场时隔十五年后扑面而来大雪，给他们

带来的感受可能与年轻的这一代重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在下雪的那天，因公事我与一个姓易的同志一起出差去北碚，她年纪比我大，前些年已从政府退休，但工作经验丰富，于是人民银行聘请她来组建城市信用联社。不幸的是，我们的车还没有出重庆市郊便抛锚了，我们只好坐在车内，一边避寒，一边观赏窗外飞扬的雪花，同时也等待单位另派车来救援。闲聊之中说到了大雪，这位姓易的老同志在感慨重庆所不易见的大雪天气的同时，也说到1976年那场大雪，并讲到她有一阵反复梦见她的一位老上级，而这位老上级在“文革”中曾经受尽磨难，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也就是重庆下起罕见大雪的那一年，她的这位老上级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她说她前一阵回到原单位，向原单位年轻的同事们说起常常梦见老上级的事，原单位的人便提醒她，是不是老上级生前交代给了什么事情没有办？于是，她在同事们的提醒下把年轻时在工作单位的一些事，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来反复回忆，结果，还真有这位老上级生前所托的一件小事未能办成。于是，她又回到原单位，向年轻同事们说了确有老上级所托但未能办好的旧事，并做了一番解释。很奇怪的是，自从当着原单位同事一番解释后，老上级便从梦萦中绝尘而去。听了这位姓易的老同志这段闲聊，于是想起已然故去一年的老父亲。因为在老父刚刚故去的那一年，自己每每都会在梦中与老父相见，甚至诸如老父在世时与老父怄气那样的事也都在梦中频频再现。于是从这位姓易的老同志的讲述中，开始想在九泉之下的父亲，是不是对这个世界，对他所艰辛抚育的生命，对他曾经是那样苦苦追求的个人立身标准之下不能自清的结局，有着某种不解的心结。

在父亲故去的第二年农历十月，我去参加了兄长的生日家宴，在吃饭中间我们兄弟二人共同说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对老父亲的病早点引起重视，如果我们真正有勇气不惧贫困，设法筹借资金，在病兆刚出现的时候就将老父亲送到省城的医院去检查，早些诊断

出病情，老父亲无论如何是不会如此早就辞世的，因为我们后来查了遵义医学院的病历档案，鼻咽癌发现于早期的病人，治疗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达到了十七年。

奇怪的是，自从我与兄长那次在喝了两杯酒后的交谈，以及在交谈中说了很多深深自责的话以后，就再没有像此前的一年时间那样，常常在梦中见到老父亲了。说起来这也算一件莫大的憾事，就因为父亲之早故而诉说了自己内心之苦，竟然再难与老父在梦中相见了，这样一种情况，与重庆信用联社那位姓易的同事说到梦中常见老上级的事前事后的变化如此之相同，让我觉得蹊跷不已，当然也不免暗暗惋惜……

一、生与死

关于老父亲之故去与生前的那些我曾经认真体会或因我少不更事而被忽略的事，应该从何处动笔，怎么写，这是我一直未想清楚的问题。仅仅简单记事，区区之笔便足够了，毕竟个体生命事件所包含时间是有止有境的，但是，要将一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亲情过程写到能准确表达人伦、生命构成，包括精神被扭曲的痛苦，人性被残酷的非人性力量桎梏，那就不是区区之笔可以完成其万一的了。之所以这样说，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在他以生命养育责任为主线的这段亲情所背靠的历史，曾经给他本人和我们这个家的其余每一个人以无法轻拂而过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包含养育责任在内的整个生活视为父亲个人的精神和意志实现过程，那么，作为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思考能力的父亲，他所要经历、同时也是比同时代其他人承受更大和更多痛苦的原因还在于：他努力想弄明白厄运降落在他头上的原因，但又不具

备条件和能力去想清楚自己与那样一段巨变历史之间特殊构成，而这种痛苦与艰难的体验，恰好是每一个有知识并且同时是有道德良知的文化人最为痛不欲生的生命体验。

想来想去，除了以尊重生命、眷恋亲情这样一个基本出发点，将比生命和亲情更为沉重的祭奠之情写出来之外，可能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毕竟，我们仍然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和自主面对自己、面对一切的社会和时代。其实，仔细梳理自己的成长过程，发现以实际生活为标准，自己真正在父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尤其是父亲。应该说，从我13岁以后，就几乎只是断断续续地生活在父亲主持的这个家里，所以，为了能够写好给老父亲的这篇祭奠性的亲情记事，这些年，一直在大脑里整理和回忆从老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些关于老父生前的事情，可是，因为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文化差距太大，父亲真正能告诉母亲的东西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对于母亲讲到的有关父亲的生前，一部分是母亲与父亲的共同经历，这一部分应该比较容易梳理清楚，对于发生的背景也是可以描述的，只有另一部分有关父亲孩提时代的经历，毕竟是母亲从族里的其他人或父亲零星的讲述中归纳而来的，所以，有关时间、地点可能会有差异存在。

这里还想说的是，对于任何个体生命而言，个性、文化、品格一定是与具体生命的脉络相一致的，而任何个体生命的脉络，又与历史的脉络是相一致的，所以，需要如实记载和讲述，可要讲述的这个生命毕竟是给予我生命的父亲，必然会涉及是否尊重我们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孝悌传统伦理准则的问题。褒贬之间，妄议严命必有不敬不孝之嫌，只有请九泉之下的老父亲原谅了。

公元1923年农历五月十七日，老父亲出生于贵州省沿河县晓景乡的一个偏僻山寨，这个山寨的人同属于一个侯姓宗族，全寨千余人口，分成10个村落散居在一条小溪的两边山峦中，父亲出生的这

个名叫“白鸡井”的山村，坐落在小溪南边山峦的半山腰中。我的祖父、祖母均为地道的农民，从曾祖父下来，祖父辈有兄弟三人，以后每家又都是单传，所以，到了老父亲这一辈，仍然只有堂兄弟三人。我从母亲那里知道的情况是，父亲儿时颇受祖父、祖母宠爱，已是六七岁上私塾念书的岁月了，课中间还从私塾回到家里扑进祖母怀中吃奶。不幸的是，在父亲刚满七岁的时候，祖母患疾因无条件治疗，丢下年幼的父亲辞别人世而去。

父亲过早地失去母爱，这或许算是父亲童年最大的不幸。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的物质条件是十分贫瘠的，我的家乡一带属于中国经济版图中极偏远农村。面对贫穷、偏僻、落后，父亲那一辈，幼年失去父母的事例实在是太普遍、太寻常了。不过，单独就衣食是否充足而言，因为祖父辈从上一辈那里继承有田土，父亲的童年生活应该还是没有受过饥馑之苦的。

还在童年便失去母爱，这在父亲一生中所留下的伤痕还是很深的，这种伤痕甚至影响到以后父亲的禀性和命运。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件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我祖父的祭日（祖父于1960年饿死于从父亲所在工厂返回家乡之后），但不管家境多么艰难，母亲在每年祖父祭日的这一天，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邻里借钱买来少许酒菜、纸钱、香烛，用以祭奠已故的祖父。在我8岁那年，祭奠祖父的那个晚上，父亲喝醉了，请来陪父亲喝酒的客人将父亲扶进了里屋。一会儿，躺在床上的父亲叫我，我应声走进里屋，发现父亲在床上流泪，我一下惊呆了，长那么大，从未见过父亲流泪，甚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就认为父亲是不会哭的。父亲把我叫到床边，然后问我：“如果我和你妈不在人世了，你怎么办？”听了父亲的话，我差点被吓哭了，我以为父亲真的马上就会死去。我那时毕竟也就不过8岁的年纪，在那么小的心灵里，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失去父母亲。以后长大了，懂得理解人情世故

的时候才知道，在父亲的内心里，一直有两块沉甸甸的伦理巨石：一是祖母早逝，母爱尽失，他应该真的体会到童心无助的无奈和伤心，所以，才在酒醉后问我那样的话，而那样的话所表达的境遇，就是我父亲童年的境遇。二是在1960年那场饿死国人的灾难中，父亲再次未能保住祖父的生命，而最终失去了他对生命赐予表达敬意的机会。这种事情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也许算不得什么，可是，父亲毕竟是旧时代的文化人，二十四孝图的那些感天动地的孝举，从小就由私塾先生、父母辈灌输进了思想里，所以，面对如此打击，岂有不将这些事铭刻于灵魂的道理。

大约是由于父亲童年时颇有学习的天资，8岁时便送去寨子祠堂里开的私塾识字和学习。以后到了16岁的时候，私塾已不足以满足父亲学习的需要，年少的父亲此时在内心里涌起了求知的冲动和需要，可祖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认为只要识几个字就行了，所以，从未想过还要让父亲往高了和深了的地方去学习。但是，父亲学习的天资被大爷爷（祖父的堂兄）看中了，大爷爷是当地的乡绅级人物，与我的祖父比起来，属于有文化有见识的人，由于善于经营，在家乡有较丰厚田土，每年农忙季节，自己家的人手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得请人来帮工。大爷爷慧眼识才，认为父亲是个读书的材料，于是鼓动着祖父将父亲送出大山，到外面更高级的学校去学习。但祖父觉得父亲太小，加上意识比较落后，极不愿意让父亲离开家，便以贫穷为理由，拒绝接受大爷爷的主张，可是，当时大爷爷在族里很有威信，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优裕，于是大爷爷不顾祖父的反对，承诺以借贷的方式，负责父亲出外求学的盘缠资用，祖父无奈于执拗的大爷爷，最终只好答应让父亲一人外出求学。

在我的记忆中，老父亲一生很少说起家乡的事，尤其是他小时候的事，当然也包括他长大成人后在外面闯荡的那几年的生活，我

所能知道的那么一点零星事，也多是从母亲的唠叨中知悉的。根据母亲讲述的内容分析，一部分内容，母亲也是从祖父那里，或是从同族的亲戚那里听来的。另一部分内容便是母亲与父亲共同生活以后自己亲身所经历的。而真正属于父亲自己独闯的生活，母亲知道得也非常少。今天回想起来，依稀记得在我开始记忆但整体性格仍然处在孩提状态的时期，父亲偶尔会向我说起一些关于家乡、关于他自己年轻时的事。

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便是父亲给我们背诵侯氏家族字辈谱，“再天元梦显，思祖广东兴，德胜加中正，世守万年春”，父亲背诵的时候，受家乡方言发音的限制，总要把“显”字发成“醒”的音，把“元”字发成“云”的音。不知是不是担心我们有一天会把侯氏家庭辈分秩序给忘了，所以，每每背诵完毕就还要告诉我说，我们三弟兄这一辈是“天”字辈，是辈分轮回后的第二辈。其实，即使是到了现在，我也难以说清楚这20个侯氏族辈的“字”是否就是我根据父亲的口述所记下来的上述20个字，因为父亲也从未将这20个字写到过纸上。到1969年，我随母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才发现村里的人们几乎全都是靠口头方式，一辈一辈地向下传递这20个字，即使是1949年以后，有关人名的书写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但我估计家乡的人们也只是以随机的方式，只要发音对了，于是就约定俗成地使用某个汉字。

1941年的夏天，刚满十八岁的父亲，独自一人走出了大山，到了与广西交界的贵州省榕江县，投考当时由国民政府创办的贵州国立师范榕江分校。有关外出求学的这段经历，也许就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生命与生活体会，而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也成了我知悉最详细和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内容。在这段生活经历中，父亲一共给我们讲过两件事，似乎这两件事就囊括了他走出大山去求学后的全部艰辛。父亲讲述得较为沉重的事发生在